

牟宗三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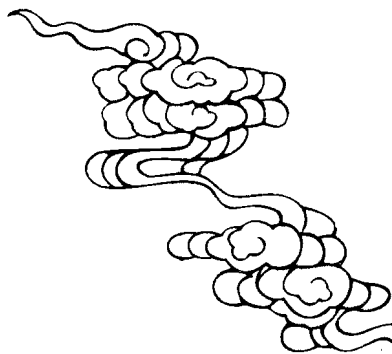
主编 吴兴文

牟宗三

中国哲学的特质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哲学的特质



本书由学生书局授权，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9-224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的特质 / 牟宗三著.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1

(牟宗三文集 / 吴兴文主编)

ISBN 978-7-5463-1395-5

I. ①中… II. ①牟… III. ①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5839号

书 名：中国哲学的特质
著 者：牟宗三
出 品 人：周殿富
策 划：国文创意
责任编辑：史 宁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8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1395-5
定 价：16.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说明

牟宗三先生(1909—1995),被认为是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师承于熊十力先生,熊先生称之为北大哲学系“唯一可造之人”。牟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并肩而立,号称熊氏的三大弟子。

牟宗三先生终生勤勉治学,致力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和更新,为正在消逝的中国文化传承血脉之存亡续绝而奔走呼号。清季民初以来的人文复兴课题,使中国的知识界一直处于困扰和焦虑状态,主流对于目迷五色的现代物质文明的追慕,催促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图腾崇拜时代,传统的中国文化被看做过时和不时髦的而被“打扫”,新儒家所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延至当下,或者稍早些,中国突然发觉自己面对的是传统的破碎败坏和“洋泾浜”式的现代化,人文复兴走向了误区,诉诸和回归传统再次成为一个轮回的主话题。于是,中国知识界“发现”了新儒家,也“发现”新儒家思考的价值。国内出版界也开始陆续出版牟宗三的作品,并一度形成了“牟宗三热”。

有趣的是,国人的研究领域也如同时尚界,凡思想成为某种时髦的时候,也是它即将过时的时候。这造成了我们对大部分的有价值的思考略知皮毛而已。想牟宗三先生也难免此一规律,且因为种种原因,牟宗三作品的出版分散于多家出版社,当然也不完整。基于这些考量,吉林出版集团计划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牟宗三文集》。在此过程中,幸而获得台湾“学生书局”等出版界同人的支持,促使此一计划得以成行。

这套《牟宗三文集》我们遴选了牟宗三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包括《中国哲学的特质》《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国哲学十九讲》《佛性与般若》《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名家与荀子》《历史哲学》《才性与玄

理》《圆善论》《现象与物自身》《人文讲习录》《政道与治道》《中西哲学会通之十四讲》，共计十三种，其中《圆善论》等五部作品为中国大陆首次出版。

出于对牟宗三先生作品的尊重，我们在稿件编辑过程中，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由于牟宗三先生的政治观点与我们有一定差异，所以我们并不赞成牟宗三先生在某些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判断方面的表述，尽管如此，凡属学术讨论范畴领域的内容，我们除了个别修改外，尽量均予以保留，以不伤害作品完整性为第一原则。希望读者在阅读中能够采取拿来主义观点，借鉴吸收其有益的建设性的部分。

· 编者

导 言

近二三十年来,两岸的人文学者在交流切磋的学术活动中,秉持存异求同的态度,逐渐取得多方面的共识,正可作为今后的“异地同心,分工合作”的基础。

我一直认为,牟宗三先生的著作与讲论,最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也最能畅发儒家义理的旨趣和时代使命。《牟宗三先生全集》已在他逝世八周年时,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共计三十二册,另有总序与详目合成的附册,以为导引和查考。由于全集各册不能零售,而多数读者又无力购买全集。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有鉴于此,乃与台北“学生书局”接洽,辑印一套简体字的《牟宗三文集》,计汇集原由“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先生重要著作十三种。其中通论中国哲学的特质、内蕴与前景者,皆详确而精当;而探索中西哲学会通之道路者,尤其明通而条达。好学之士循而读之,必可日起有功,大有进益。

依笔者的体认,牟先生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可以从五方面加以说明。

(一)表述心性义理——使儒道佛三教的智能系统,焕然复明于世

如:《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便是分别讲论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教、宋明理学的专著。经过深透的疏导解析,再上通于先秦儒道二家的原始典型,则中国哲学的系统骨干、义理纲脉及其思想演进发展之关节,便朗然而明白了。

(二)发挥外王新义——解答中国文化中的政道与事功的问题

如:《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三本书,便可代表牟先生的新外王学。传统的仁政王道、民本民贵,何以未能开出民主政体?经典中的“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教训,又何以

出不来科学知识？这些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世纪困惑，从来没有人能提供通盘的解答。而牟先生则作了彻底的大反省，他提出的“三统并建”，即（1）民族文化生命立本的问题（道统的光大）；（2）建立民主体制的问题（政统的继续，开出政道）；（3）发展科学知识的问题（学统的开出，所谓良知自我之坎陷，即是对此而发）。牟先生提供的是新外王实践的方向和途径而分门别类的具体工作，则是士人与公民都必须担负的共同责任。

（三）疏导中国哲学——畅通中国哲学史演进发展的关节

如：《中国哲学十九讲》，书中所讲，不是一时的兴会，也不是偶发的议论，而是切关中国哲学之系统纲格与义理宗趣之综述。书中厘清的问题，对中国哲学之发展具有重大的启发性。牟先生能完成这样通盘兼顾的哲学大工程，不只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上的大事，从一个哲学家继往开来的意义上看，也是古今罕见的。而相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源流系别、开合发展，与重智一系之分疏等等之问题，在他书中也做了深广详审的探讨。（笔者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便主要是依循牟先生开显的纲脉而写成。）

（四）消纳西方哲学——译注三大批判，融摄康德哲学

本文集虽未编入牟先生对康德三大批判的中译本，却采编了牟先生消化康德与融摄康德的专著，如《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牟先生对康德三大批判的译注工作，持续十年之久。他随时比对，随时查核，几乎每字每句皆细加考虑，一定要达于表意而且能站得住而后可。他译注康德书所表现的精诚审识，实已重现了晋唐高僧翻译佛经的风范。他不但译，还作注，有时一条注文便长达两三千言。译注之外，他还另撰专著，来消化融摄康德。这样的学术精诚，也是古今中外鲜见其比的。

（五）会通中西哲学——疏导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

如：《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是一部通盘考虑中西哲学会通的书。如所周知，中国儒道佛三教都讲生命的学问，和西方知性文化中的知识之学有所不同。中西哲学对“感触界”（现象界）与“智思界”（本体界）之或重或轻，或消极或积极，正是中西哲学会通的关键。

键所在。牟先生借取佛教“一心开二门”(真如门相当于康德之智思界,生灭门相当于康德之感触界),而指出中西哲学皆是开二门。但二门孰重孰轻,或是否已充分开出来,则彼此有所不同。顺此而涉及的中西哲学之种种问题,牟先生都已作了层层之比对和深入之疏解。

除了上述五点,而尤为可贵的是牟先生的学术生命,一直在运转,一直在深入,一直在开扩。一般学者的学问,在四十、五十岁以后,通常只有“量”的增加,很少再有“质”的升进。而牟先生的一生,可说年年在进步、时时开新机,他所开显的思想家的型范,是极为罕见的。

总之一句话,牟先生的著作,无论深度、广度、高度、纯度,都是第一等的。读者细心循读,必可有得。愿与天下有志者共勉之。

东海大学荣誉教授蔡仁厚谨述
己丑(2009)十二月于台中市椰风北轩

牟宗三小传

牟宗三先生,字离中,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一个多山的小县。他自幼聪颖,喜读书,生长在四季气候分明、环山一块平原里的村庄。1927年,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直升哲学系。1932年遇见熊十力先生,为其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从此开启了人生之慧命。这慧命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生命”之生命,“我就是道路”之道路。

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正逢“五四运动”后期,结束了清末民初的清客学风,同时也结束了清末民初的那浮浅的孤离的政治意识、民主共和意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及孙中山先生和那时所具备的意识。他研读《朱子语类》因而引发了直觉的解悟,顺此兴会注意了当时流行于国内的西方学说;包括柏格森的创化论、杜里舒的生机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罗素哲学、数理逻辑和新实在论等。课余进修的重点,则在于《易经》和怀悌海哲学研究。从怀悌海哲学中引发了对宇宙论的兴趣,从美之欣趣,想象式的直觉解悟,转入为何如何之“架构的思辨”;也要从外在化提升起来而向内转以正视生命。更由于广读易书,由此而认知中国除了历圣相承的“仁教”之外,另有一个“智学”的传统。

1934年,牟先生自北京大学毕业,先后执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讲授逻辑与西方哲学。自30岁至40岁间,由于致力于逻辑数学的解析,而写成《认识心之批判》,将西方近代学术的两大骨干——罗素的《数学原理》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融和调适,扭转罗素的歧出,照察康德的不足。同时自熊十力身上体认:吾华族有最独特最根源之慧命,不于此而讨安身立命,立定宗教,以自肯其大信,反而割截其根而从摩西耶和犹太民族之历史,以数人家珍,是自卑自贱而甘于为国际游魂随风而飘荡也。牟先生自认,唐君毅先生是他一生谈学问与性情最相契的

一位朋友,他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也。”

1949年,牟宗三先生渡海至台湾,任教于台湾师大与东海大学。主授逻辑、中国哲学及人文课程。在台期间,本于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时代学术的沉痛感受,乃发愤从根本处疏导中华文化生命的本性,进而谋求民族生命的远大前途。这段沉潜反省期间写成《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三本著作,三书共同的目的,即本于中国的内圣之学以解决外王事功的问题。尤其在政治方面,更笃信在治道之外,再开辟出政道,才足以完成近代意义的民主建国理想。

1960年,离台赴香港大学讲学,后由港大转任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主任。前后教授过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南北朝隋唐佛学以及康德哲学、知识论等课程。1974年退休,转往新亚研究所授课。

自50岁后,始终本于强烈的文化意识与学术意识,致力于儒、释、道三家义理的疏解。如以《才性与玄理》表述魏晋玄学,以《佛性与般若》表述隋唐佛教,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表述宋明理学,即阐释自魏晋起中国学术的脉络发展,以及儒、释、道三教的义理系统。除了旧学的邃密加深外,亦兼顾到新知的涵养与开发,以期能光大中国哲学的传统,开创民族文化的生机。同时译注康德的《纯粹理性之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以资对照,并撰写《现象与物自身》以及《圆善论》,此乃对于康德前两批判之消化,以立基于中国哲学的传统,谋求与康德哲学会合,更借以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以弥补康德哲学的不足。

最后,谨以牟先生自己的话作为结语:

学术生命之畅通,象征文化生命之顺适;
文化生命之顺适,象征民族生命之健旺;
民族生命之健旺,象征民族磨难之化解。

附识:本文参考牟宗三《五十自述》,与唐君毅等《生命的奋进——四大学问家的青少年时代》。

吴文兴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北京

此小册便于初学,但因是简述,又因顺记录文略加修改而成,故不能期其严格与精密。倘有不尽、不谛或疏阔处,尤其关于《论》、《孟》与《中庸》、《易传》之关系处倘有此病,则请以《心体与性体》之《综论》部为准,以求谛当,勿以此而生误解也。

此讲辞以儒家为主,盖以其为主流故也。若通过《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再加以综括之简述,则当更能尽“中国哲学的特质”一题名之实,而凡所述者亦当更能较精当而切要。唯如此之简述,内容虽可较丰富,然与西方哲学相对较以显特质,即使不加上道家与佛教,亦无本质的影响也。故此小册题名曰《中国哲学的特质》,纵使内容只限于儒家,亦无过。

牟宗三 序于香港

一九七四年八月

本讲演是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所规定的题目。约定十二次讲完,每次一小时。在这十二次里,想把中国哲学的特质介绍给社会上公余之暇的好学之士,当然是不很容易的。如果是轻松地泛泛地讲述,那当然比较具体一点,听起来也比较有兴趣。但这样恐怕不会有真正的了解,也不是这个倒塌的时代讲中国学问之所宜。因此,我采取了直接就中国学问本身来讲述的办法。这也许听起来比较艰难一点。但若因此而稍能把握一点中国学问之内在本质,或即不能把握,而艰难之感中,引起对于中国学问之正视与敬意,这也并非无益处。

中国哲学包含很广。大体说来,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中心。但我这里是以中国土生的主流——儒家思想,为讲述的对象。其余皆无暇涉及。

本讲演并无底稿。在讲述时,托王煜同学笔录。口讲与自己撰文不同,而笔录与讲述之间亦不能说无距离。如果我自己正式撰文,也许比较严整而详尽。但有这个时间限制的机会,也可以逼迫我做一个疏略而扼要的陈述。这也自有其好处。而王君的记录也自有其笔致。换一支笔来表达,也自有其新鲜处。顺其笔致而加以修改,也觉得与我的原意并不太差。紧严有紧严的好处,疏朗有疏朗的好处。是在读者藉此深造而自得之。

001	《中国哲学的特质》再版自序
003	小序
001	第一讲 引论：中国有没有哲学？
009	第二讲 中国哲学的重点何以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
015	第三讲 忧患意识中之敬、敬德、明德与天命
021	第四讲 天命下贯而为“性”
029	第五讲 孔子的仁与“性与天道”
037	第六讲 由仁、智、圣遥契性、天之双重意义
047	第七讲 主观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
059	第八讲 对于“性”之规定（一）《易传》、《中庸》一路
067	第九讲 对于“性”之规定（二）孟子一路
077	第十讲 复性的工夫
089	第十一讲 中国哲学的未来
099	第十二讲 作为宗教的儒教

1

第一讲 引论：中国有没有哲学？



中西哲学，由于民族气质、地理环境与社会形态的不同，自始即已采取不同的方向。经过后来各自的发展，显然亦各有其不同的胜场。但是中国本无“哲学”一词。“哲学”一词源自希腊。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们现在把它当做一通名使用。若把这源自希腊的“哲学”一名和西方哲学的内容合在一起，把它们同一化，你可以说中国根本没有哲学。这个时代本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人们皆一切以西方为标准。这不但西方人自视是如此，民国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说来，亦无不如此。所以有全盘西化之说。中国以往没有产生出科学，也没有开出民主政治。这是不待言的。说宗教，以基督教为准，中国的儒释道根本没有地位。说哲学，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所以人们也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这样看来，中国文化当真是一无所有了。构成一个文化的重要成分、基本成分，中国皆无有，哪里还能说文化？其实何尝不是如此？说中国以往没有开发出科学与民主政治，那是事实。说宗教与哲学等一起皆没有，那根本是霸道与无知。人不可以如此势利。这里当该有个分别。西方人无分别，还可说。中国人自己也无分别，那就太无出息了。

“五四”前后，讲中国思想的，看中了墨子，想在墨子里翻筋斗。其他皆不能讲。既无兴趣，也无了解。原来中国学术思想中，合乎西方哲学系统的微乎其微。当时人心目中认为只有墨子较为接近美国的实验主义。实则墨学的真精神，彼等亦不能了了。彼等又大讲《墨辩》。盖因此篇实含有一点粗浅的物理学的知识，又含有一点名学与知识论。虽然这些理论都极为粗浅，而又语焉不详，不甚可解，但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单单这些已经足够吸引那些浅尝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学者。因此，研究墨子，其实是《墨辩》，一时蔚为风气。钻研于单词碎义之中，校正训诂，转相比附。实则从这里并发现不出真正科学的精神与逻辑的规模。而那些钻研的人对于逻辑与西

方哲学,也并无所知,连入门都不可得,更不用说登堂入室了。舍本逐末,以求附会其所浅尝的那点西方哲学,而于中国学术之主流,则反茫然不解。

后来冯友兰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彼在《自序》里自诩其中之主要观点是正统派的。可是冯书之观点实在不足以言正统派。冯书附有陈寅恪和金岳霖二先生的审查报告。其中陈氏多赞美之语,如说冯书“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此实亦只貌似如此,何尝真是如此?陈氏是史学家,对于中国思想根本未曾深入,其观冯书自不能有中肯之判断。至于金岳霖先生,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他看出冯书“讨论《易经》比较辞简,而讨论惠施与公孙龙比较的辞长。对于其他的思想,或者依个人的意见,遂致无形地发生长短轻重的情形亦未可知”。金氏虽知冯氏之思想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但是力言冯氏并未以实在主义的观点批评中国思想。这虽在冯书第一篇容或如此,但在第二篇就不见得如此。冯氏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当然是错的。以此成见为准,于述及别的思想,如陆、王,字里行间当然完全不相干,而且时露贬辞。这即表示其对于宋明儒者的问题根本不能入。对于佛学尤其外行。此皆为金氏所不及知。金氏早声明他对于中国哲学是外行。我们自不怪他。

同时冯书另一致命缺点,那就是分期的问题。冯书分二篇。首篇名为《子学时代》,自孔子以前直至秦汉之际,类似西方古希腊时代。次篇名为《经学时代》,由汉初至清末民初之廖季平,这又类似西方的中纪。但并无近代。冯氏以西方哲学之分期方式套在中国哲学上,显为大谬。至于冯书特别提出并且注重名学,对《墨辩》、《荀子·正名》篇,以及惠施、公孙龙等的名学所作的疏解,当然并非无价值。而且对中国名学之特别重视,仿佛提供了研究中国哲学一条可寻的线索。可惜先秦的名学只是昙花一现,日后并未发展成严整的逻辑与科学方法。所以名学不是中国哲学的重点,当然不可从此来了解中国之传统思想。故冯氏不但未曾探得骊珠,而且其言十九与中国传统学术不相应。